

《廣西社會科學》

(增 刊)

中法戰事史事集

2

一九八六年

广西社会科学院主办

《广西社会科学》

(增刊)

中法战争史事集

一九八六年

K256.2
5
1

广西社会科学

(增刊)

中法战争史专集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出版

编辑者 广西社会科学编辑部

南宁市新竹路30号

广西社会科学院内

印刷者 广西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订阅处 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广西壮族自治区报刊登记证 第227号 定价1.60元

前 言

中法战争史的研究，在有关科研机关、大专院校及近代史学者们的关怀、扶持下，近年来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大体说来已从战役简介、人物评价阶段逐步深入到经济状况、政治背景、战略目标、战术运用等领域的综合研究。许多同志也一改为应付学术讨论会赶写“入场券”的旧习，认真地坐下来结合本身的科研、教学任务，或对自己有研究兴趣的一些课题，广泛搜集史料，深入钻研，陆续写出了有根据、有分析、有见地的文章。既深入探索了中法战争有关战役的起因、过程和影响，也加深了对参战三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活动以及中法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中越近代关系史中的影响的理解，同时也顺理成章地以无可争议的史实驳斥了越南某些别有用心者的无端攻击。

为了继续开展学术交流，推动中法战争史、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我们在编辑《中法战争论文集》第一、第二集的基础上，又从一些论文、译文中选编这个集子，并计划

FNBE / 11

今后每年编选一集。因篇幅有限,对一些长文不得不在保留作者论点的情况下作一些删节,敬希鉴谅。

为了扩大视野,介绍国外的研究动态,便于了解外国学者对中法战争有关问题的观点,我们全文登载了法国学者巴斯蒂夫人1986年12月1日在南宁所作的学术报告,同时还选编了国外其他学者的一些论述。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庾裕良、萧德浩、范宏贵、吴国强、黄振南、廖宗麟同志。由于水平限制,编辑工作中的错漏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

本书的编辑出版,得到区党委领导同志及宣传部、区社会科学院、区出版局的支持。借此机会,谨向关心中法战争史研究、关心本书的同志们致谢。

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

1986年12月

《广西社会科学》编委会

名誉主编： 莫乃群

主 编： 范 阳

副 主 编： 严永通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刘映华 何异煌 严永通

范 阳 张 胤 郭 明

廖子良

本专集 执行编辑

庾裕良 萧德浩 范宏贵

吴国强 黄振南 廖宗麟

目 录

前言	(1)
试论中法战争中清阮宗藩关系的实质 和作用	峤 秉 宗 麟 壮 强 (1)
关于镇南关大捷在中法战争中的战略 地位问题——与杨志本、王苏波同志商榷	王承仁 (19)
镇南关—谅山战役刍议	庾裕良 (29)
中法战争时期越南阮朝的态度	萧德浩 (56)
中法战争中北圻清军兵力考	刘 庆 (68)
中法战争中的孤拔舰队	杨志本 王苏波 (73)
中法战争与云南的半殖民地化	孔祥祚 (84)
中法战争的影响：台湾建省	杨彦杰 (97)
彭玉麟和中法战争	邱展雄 (112)
论张之洞在中法战争中的对外态度	钟康模 (122)
试论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的战守方略	黄振南 (131)
评中法战争中的岑毓英	龙永行 (148)
周德润及其思想分析	俞 政 (161)
唐景崧与中法战争	廖宗麟 庾裕良 (174)
欧阳利见功过考评	炎 明 (191)
冯子材的一生应如何评价 ——兼谈评价历史人物的时景观	彭大雍 范宏贵 (198)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法国的经济政治概况	[法] 玛丽亚娜·巴斯蒂—布吕吉尔 (206)
我们与中国在东京的冲突 (1884—1885)	[法] 勒内·里斯特勒贝 张永平译 (234)
1884年的香港暴动：一起发生在中法战争期 间的民众反帝抗议事件	蔡钟芳著 韦 妮译 (261)

试论中法战争中 清阮宗藩关系的实质和作用

嵇 粟 宗 麟 壮 强

中法战争是由法越战争演变而来的，导致中国卷入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清、阮王朝之间存在着宗藩关系。宗藩关系是封建等级制度在封建国家关系上的反映，这种关系的产生、演变和消亡过程，不但与封建制度的盛衰密切相关，也与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强弱顺逆情况息息相连。在清阮宗藩关系存在的九十多年中，也经历了不寻常的演变。认真地研究这些演变过程及原因，对于我们了解它在中法战争中的实质和作用，无疑是有帮助的。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这些本来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却被认为有碍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人为地束之高阁，没能及时、深入地研究。以致形成了虽不大可也不小的薄弱环节或者说夹缝。随着中越关系出现波折，越南的一些政治家和史学家，便趁机而入，不惜歪曲历史的真相，把早已成为陈迹而且只残留某些封建礼仪的清阮宗藩关系硬与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相提并论，借此来丑化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形象，在越南国内煽动民族仇恨，以达到反华排华的目的。他们这些违背历史事实的恶意宣传，不但充斥于越南国内的报刊书籍，而且在对外宣传品中也是连篇累牍，惑乱视听。因此，纠正被歪曲的历史事实，不但有益于中国近代史、中越近代关系史的研究，也可以揭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制造的谎言，以正视听，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一、清阮宗藩关系的建立和演变

中越人民之间的联系，可以上溯到远古的神话传说时代，例如我国古籍《淮南子》、《史记》、《吕氏春秋》都记载了关于神农、颛顼、尧、舜、禹等神圣抚育交趾的传说。与此相应，在越南重要史籍《大越史记全书》中，也有越民始祖为神农的说法。这些远古传说中的共同神话，往往反映了这些先民的紧密联系。后来，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强，中越两国人民还形成了共同的文字、习俗以及相似的政治制度。

众所周知，华夏先人曾率先利用黄河、长江流域的地理、气候、物产、人口、文化、交通等有利条件，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建立起一个雄踞中原的封建大国，并逐步将封建制度推向历史的高度，形成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对整个人类世界产生了广泛的、深远的影响，并使国内的社会生活以及与周围小国间的交往都打上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烙印。一般说来，奉行封建等级制度的统治者，都会依据本身的力量及周围的局势而执行压内掠外、附强凌弱的政策，并随着这种弱肉强食、以大并小的激烈角逐，形成大国控制小国、小国依附大国的宗藩关系。显然，这种宗藩关系是—定历史时期中特定地区的封建国家、集团间力量消长的反映，它既然是封建制度的产物，也必然会随着封建制度、封建国家的盛衰而逐渐演变。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中越人民曾作为兄弟民族而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封建大国之中，—同蒙受了漫长而黑暗的封建统治。又因封建统治者之间不断发生征战和攻伐，在它们的淫威笼罩之下的各族人民，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伤害，从而留下不愉快的陈迹。但是，中越人民毕竟携手并肩走过了一段长期的路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相应的进展。如果恢复历史原貌，将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扩张、吞并、掠夺、欺凌等一系列罪

行记在他们帐下，则应该说中越人民之间一直保持着水乳交融、有无相济的兄弟情谊，尤其是在共同反帝斗争中结成的战斗友谊更为深厚，“源远流长、兄弟情深”，显然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概括，说出了中越人民的心声。

自从中唐发生安史之乱后，中国这个泱泱封建大国开始走下坡路了，到了宋代，为了对付新崛起于北方的契丹族的威胁，被迫将防务重心北移，从而放松了对南方的控制。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越南丁部领力平群雄，统一各郡，建立了瞿越国，自号大胜。但为了应付内部及周围的敌对势力，他仍须借助宋王朝的声威，于是向宋王朝请封为交趾郡王，是为越南脱离中国封建王朝而独立建国之始，同时也是形成中越之间以大控小、以弱附强的宗藩关系的开始。

宗藩关系，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从表面上看，藩属国的国王必须由宗主国认可册封，而且定期向宗主国进贡和觐见，似乎宗主国对藩属国的控制很严，但从宗主国绝少干预藩属国的政治、经济、内政、外交的实际情况分析，则不难发现这种降尊事大的从属关系不过是偏重于表面形式的政治联系，或者说是一种礼仪性的交往。从宋开宝初年到清光绪中叶，中越宗藩关系保持了九百多年，其中经历了数不清的册封、朝贡，但究其实，许多堂皇的册封往往都只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主动权并不完全操在宗主国之手。例如，公元979年，黎桓篡夺了丁氏政权，开始，宋王朝曾派兵为丁氏撑腰，后因出师不利，只得接受黎桓的谢罪表，封他为交趾郡王，甚至当黎桓起兵侵犯邕州时，也以睦邻为重，不加讨伐；又如公元1009年，李公蕴夺取黎氏政权，遣使请封，宋王朝便照封不误，后来李朝乘虚攻陷钦、廉，围攻邕州，屠杀并掠走数十万居民，宋王朝被迫发兵声讨，但当李朝遣使“服罪”后，便立即罢兵修好，还允李朝之请，将邕辖广源州相赠。由此可见，宗藩关系中的不平等性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但会随着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实力的变化

而增强或削弱，甚至还会出现藩属欺凌宗主的情况。

十三世纪中叶，元蒙入主中原，不久便开始对周围诸国展开了历史上罕见的军事讨伐，交趾也因此屡遭兵燹，不得不在强大的兵威下屈服称藩，被迫一再声明要世守职贡。尽管这次黠武扩张的风暴的形成原因尚有待深入探讨，但有一点应该肯定，即当时的中国各族人民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368年朱明王朝建立后，曾为了维护越南的正统而派兵入越扶持陈氏王朝，助剿反陈的黎氏，后又以陈氏无后，便将藩封三百多年的安南改由明王朝的地方官布政使司管辖；永乐年间，黎利起兵反对明王朝对安南的直接统治，明王朝见黎氏已实际控制了安南局势，便照例承认既成事实，封黎利“权署安南国事”，后来又先后承认了莫氏的篡权及黎氏的复辟。

清廷取代明王朝后，越南黎氏王朝主动向清廷缴送明王朝所赐敕印，要求给予新的册封，康熙皇帝遂将安南都统使司改为安南国王。乾隆年间，阮光平推翻黎氏政权，建立了阮氏王朝，并请求清廷册封，清王朝不记援黎兵败之仇，不但循例照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而且赏赐有加。嘉庆七年（1802）阮福映虽然是借法国兵推翻了阮光瓚，自称嘉隆帝，但为了取得合法的统治地位，他也不得不援旧例向清王朝请封，并居心叵测地要求将国名改为“南越”。但嘉庆皇帝十分清醒，没有被奇异的贡品和动听的谰辞所迷惑。他一面下诏嘉奖阮氏请封的忱忱，一面又将所请国名由“南越”改为“越南”，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同时在册封诏书中明确指出：汉时赵佗的南越国疆域甚广，两广亦在其中，而阮福映所领不过是交趾故地，其所封之地在百越故地之南，以越字冠于上，乃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下，乃表其新锡藩封，不致与古南越国相混淆，字义亦属吉祥。①这一封赐，固然是越南国得名之始，这一明谕，也是区分赵佗带领岭南各族人民创建于汉初的“南越”，与阮福映领导安南各族人民创建于清代中叶的“越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的界线。由于历史的原

因，汉初赵佗的南越国疆土曾包括交趾北部，但交趾自970年独立建国后，九百多年来一直活动在印支半岛的交趾故地，即使阮福映的实际领地也只限于这个半岛的中北部。既然如此，当然就没有理由沿用两千年前的“南越”国名造成混乱。事实上，阮福映所以要求赐国名为“南越”，当然不是由于突发慕古幽思，而是妄想有朝一日，凭着“南越”的名称，将它统治下的安南国土扩张到昔日的南越疆域。所以，清嘉庆皇帝为越南国赐名，不只是显示宗主国权威的简单文字游戏，而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英明决策，不但给阮福映的扩张野心以当头棒喝，也严实堵住了阮氏后世及其继承人们向北扩张的各种口实。

从以上简单的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在中越宗藩关系中，由于宗主国控制了藩属国王位的册封大权，还要对方定期朝贡、觐见，因此，它们之间毫无疑问地存在着以大控小的不平等性质，是封建等级关系的反映，但是，藩属国由于内部原因，特别是在政权更迭的时期，也需要依附宗主国的威望来确立和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可以说，中越宗藩关系的长期维持，原因在于与两国封建统治者的切身利益有关，并不单纯依靠暴力征伐。同时也要看到，它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的程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双方实力强弱的消长而不断变化，历史上发生过的许多关于宗主国干涉、征讨藩属国的事件，大多属于维护旧藩属的统治权，亦即维护宗主国的册封权，并没有领土的要求。在藩属国方面，也曾发生过攻掠宗主国的边境、提出领土要求的事例。但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都是带着很大偶然性的微波细浪，主流则还是两个国家的人民之间的互相依存和联系。

但是，近几年来，越南史学界和政治界的一些人，却矢口否认中越两国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宗藩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中越宗藩关系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已经存在了九百多年的客观事实，绝不能因为某些人的不承认而从历史上将

它抹掉。现在之所以重提这些往事，是为了汲取历史教训，并不是故触创伤。其实，承认这种历史上的宗藩关系也决不会有损越南人民的形象，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创造。中越两国人民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都经历了痛苦的岁月，遭受过各种磨难，进入近代以后，两个民族都被西方殖民者打下了屈辱的烙印。但是，苦难磨炼了人民，中越两国人民是酷爱自由的人民，他们不甘奴役，而是奋起斗争，经过了长期的流血牺牲，终于赶跑了侵略者，作了自己国家的主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几乎每个民族都经过曲折、艰苦的历程，但这些既然是历史，就不会影响它经过奋斗而应享的荣誉。

二、清阮宗藩关系在中法战争中的作用

两次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不但轰开了闭关锁国的封建帝国的大门，而且也打击了清朝统治者以我为中心的上国优越感，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使它不但逐渐折其藩篱，就连它的本土主权也难保而沦为列强掠夺的目标。它与周围藩属国的关系也更为松弛，有的甚至变得名存实亡了。

越南阮氏王朝看到清王朝已经日渐衰落，自顾不暇，就千方百计地设法摆脱清王朝的控制。它不但不再遵守历代的朝贡制度，还想投靠西方列强之一的法国，希冀借助法国的势力来摆脱清王朝的约束，以便建立一个独立的封建王国。于是，它背着清廷和法国订立了有“越南为自主之国”条款的条约，“法国于同治十三年（1874）与越南所定约款，越王并不先行奏闻，其受法所饵，乐为自主之国，不愿为中国统属，居心实不可问。”②

这时的阮氏王朝虽然已对清王朝怀有二心，但由于越南国内各派力量之间的斗争激烈，它仍需要借清王朝的影响和帮助来维

护自己的利益。光绪初年，它请求清政府派兵入越帮助平定李扬才之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剿平李扬才后，清军准备班师回国时，阮氏王朝又再三请求清政府留军北圻，剿灭各股农军后再撤。清政府鉴于北圻农军聚散不定，大军难以一一追剿，只同意选留数营清军驻扎谅山附近，一面继续搜捕农军，一面作阮朝的声援，以遏止企图在占领南圻后继续北犯的法军的侵略势头，这是清政府派兵援越抗法的开始，也是它依据宗主国保护藩属国的惯例对越南的安危继续承担义务。从清阮双方的文献纪载考察，这种“派兵助剿”及“留军助守”都没有领土要求。

从光绪六年（1880）起，法国侵略者加快了并吞越南的步伐，光绪七年夏间，“法国海部商之议院，欲筹款添置兵船于安南东京一带”，③以驱逐黑旗军、保护商路为名，悍然派兵侵犯北圻，战火蔓延到中国边境。

清政府获悉法国的阴谋后，出于维护自己的西南边疆以及越南北圻的安全，于光绪七年底派出道员衔的招商局员唐廷庚前往越南国都顺化，向越王代表阮文祥等通报了法国的阴谋，越王闻信，忧闷无已而又束手无策，只得于十二月二十八日派阮文祥通过唐廷庚向清政府提出援助请求：“惟求垂念下国世守藩封，速赐解救。”④这是阮氏王朝看到法军居心叵测，局势垂危，才转而求清政府发兵抗法，从这时开始到光绪九年冬（1883）的将近两年的时间内，据不完全统计，阮氏王朝通过各种渠道，以不同的方式，共向清廷提出三十余次请援要求。

光绪七年冬，阮氏王朝通过唐廷庚向清廷的求援，由于是据唐廷庚通报的敌情，而尚没有看到法军的实际行动，加上猜疑清廷，所以态度比较消极，侧重要求清廷在外交上与法方理论，而没有提出军事援助，所以清廷的反应也比较冷淡。

光绪八年三月，背信弃义的法国侵略者突然发兵攻打河内，形势骤然恶化。越南阮氏朝廷经过多方衡量商议，才决定向清廷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阮文祥请唐廷庚代稟两广督抚亮，“发兵

救助”。⑤越官阮籍来粤会晤唐廷庚说：“事情甚迫，下国王甚忧闷，满朝臣子望天朝拯救，如婴儿之望父母。”⑥鉴于形势严重以及阮氏王朝的求援迫切，清政府很快作出反应，于四月十四日指示滇、粤两省官员“即当乘时合力经营，毋落后著，广东兵轮各船应克期整顿出洋，藉壮声威。”⑦五月初二日，又指示云贵总督刘长佑：“即著飭令道员沈寿榕带兵出境，与广西官军联络声势，以剿办土匪为名，保护越南，即所以屏蔽吾圉。”⑧同月，又指示徐延旭出关督办军务。清政府的这些行动，对于越南军民的抗法斗争是及时而有力的支持。

攻占河内的法军兵力有限，闻知中越两国各路援兵前来，即匆忙撤出河内，然后假惺惺地派人和越南政府谈判，形势暂时和缓下来。这时，阮氏王朝对中国的态度也起了变化，对于中国的出兵援越和允助刘永福抗法的做法，明确表示不满。五月二十九日，越官陈叔诒会见前来联络的中国官员马复贲提出：“彼族疑忌万端，见内地云、广各路陈兵，谓下国藉天朝之声威，是以不守旧约。若不即早为料，则上列此来徒劳无功。”又说：“日昨刘团申奏，谓现受中国大宪密嘱，令其保护通云之路。若果大宪暗助刘以拒彼族，则专顾内地，不恤下国，各大宪何忍出此？”⑨由于阮氏王朝态度的反复，清政府放慢了出兵援越的步骤，甚至打算撤军回国。

但是，法军并未因清军放慢援越步伐而推迟对北圻吞并，阮氏王朝才意识到法国侵略的严重性，只好重新向中国提出援助的要求。光绪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越南国王咨署两广总督曾国荃，以法军赖住河内不撤，请求中国援救：“法国兵船仍然泊住河内省津次，城内住兵则既不肯撤出，而又于住所构作廨房，砌作限墙炮门，城外日夜演习兵炮，其情实未可测……惟望列位大人鼎力扶持，作何办法。得蒙荫庇早一日，则下国兵民受一日之赐，实有不胜盼祷。”⑩这封咨文的求援之心虽切，但仍吞吞吐吐，没有明言请中国出兵。延至光绪九年元月，形势更加严重，十四日，越南

国王致函曾国荃，以法军闻知清军准备撤回竟复肆横，要求中国留军越南以胁制法军：“仍飭诸营兵各留下国择地遥扎，搜匪卒功。遇彼横发何处，即协与下国出力剿除，诸营统领已得奉有钧令，不至迟应，俾下国赖以安静，不胜翹企之至……希将此情转咨广西、云贵督抚部堂列位大人钧审，各飭下诸统领一体留扎，以资援应，是切祷也。”^⑪二月初九日，抵达天津的越南陪臣范慎燾等向李鸿章呈递了越南国王的密函，要求与清军合作战斗：

“近得唐（景崧）主事笔议云：有词令必有干戈，方能兼济，上国一定办法，如此是诚然矣，但念下国诸省皆属沿海，而京都甚近顺安汛，最为深广，防不胜防，是以不敢轻试，如不得已出此，必赖上国如何布置周密，可保十分无碍，方免为德生祸。若他敢尔先发，亦必有诸道贵弁在此，方敏应援，则他未敢妄动矣。”^⑫

对于阮氏王朝的求援，署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建议敕令徐延旭出关治军：“经划北圻，大修战备，与黄佐炎、刘永福联络声势，”争得主动，“以战则可以胜，以守则可以固，以和则可以成。”^⑬清政府纳奏，于二月十五日降旨：“藩司徐延旭于关外情形较为熟悉，著即出关，相度机宜，豫筹布置，准其专折奏事，该藩司务当与黄桂兰、赵沃等和衷商榷，妥慎筹办，并将布置情形随时具奏。”^⑭接旨后，徐延旭于三月二十日由陆路前赴边防，四月十六日出镇南关，五月初二日行次北宁，调遣增募勇营至五十余营约二万人，以之布置北宁防务。

二月十八日，穷凶极恶的法军悍然开炮轰击南定城，战至十九日占领该城，接着又分投攻掠各省。二月二十六日，越南国王紧急咨呈曾国荃请援：“兹法国全不顾名义，肆其蚕毒，深恐下国兵力单虚，难以抵御。现情紧迫，将谁因极字小恤患，实惟上国是赖。輶此具由布达，统维贵大人钧照，特派海道水运轮船并接界陆路诸营兵迅来下国应援，凭仗天威，下国素赋以从，兵民誓心同仇，必期雪此耻恨，以保疆圉。”^⑮

三月，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纸桥痛歼法军，阵斩敌酋李维

业。法军老羞成怒，出动大军侵入北圻，越南面临亡国的严重危机。五月初三日，越南国王咨呈署北洋大臣张树声告急求援：

“飞调水陆各道营兵速来援助，保藩封以固边圉，又下国都城地势滨海，而屯炮又甚生疏，未必十分能守，希为即委文武干员乘兵轮船三四只，炮械精足，先顺安汛镇压，俾他有所慑而不敢肆，下国亦有所恃，悉力供应以俟命，庶期周固。”^{①⑥}

七月，法军进攻越都顺化，十六日，越南新王阮福升稟告广西巡抚倪文蔚求援：“现则下国惟有力为守拒，以待朝命……希即设法乘兵轮援助，俾得早舒。是仰赖列宪大人救灾恤患之恩，下国啣感于无既矣。”^{①⑦}

随着越南局势的逐步恶化以及越南政府求援的日益迫切，清政府也加紧入越援助，三月初八日指示滇、粤督抚：“事已中变，情殊叵测。在我保护属邦，固守边界，均关紧要。著岑毓英、倪文蔚、杜瑞联督飭关外防军，挑选劲旅，扼要进扎。”^{①⑧}二十五日，又派李鸿章前往督办三省军务，并调江南防军赶赴前敌：“现闻法人攻破越之南定，势更披猖。越南积弱之邦，被其蚕食，难以图存，该国列在藩封，不能不为保护，且滇、粤各省壤地相接，倘藩篱一撤，后患何可胜言？本日已谕令李鸿章前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此时防务紧要，必须厚集兵力，进止足恃，方可相机因应。江南防军何营堪备调拨，著左宗棠悉心筹划，迅速奏闻，钦此。”^{①⑨}但清廷限于自身的财力兵力，只能从陆路派军援守北圻，难以派海轮前往顺安。七月，法军攻破顺化，阮氏王朝签约投降。九月三十日，清政府谕令前敌清军：“法人既与越南立约，必将以驱逐刘团为名，专力于北圻。滇、粤门户岂可任令侵逼！现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法使，告以越南久列藩封，历经中国用兵，力为保护，为天下各国所共知。今乃侵陵无已，岂能受此蔑视？倘竟侵及我军驻扎之地，惟有开仗，不能坐视等语。如此后法人仍欲逞兵北圻，则我之用兵，固属名正言顺。”^{②⑩}并指示徐延旭、唐炯速赴前敌，力保北圻。